



中國人民大學

學報

工作论文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

“唯物辩证法”与革命文学理论建设

——以后期创造社为中心

李金花

JRUCWP2026023

2026. 03. 17

- * 本刊编辑部将那些已通过审稿程序而处于“拟录用”状态的稿件制作成线上展示的工作论文，旨在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而促进学术进步。编辑部还将继续与作者共同努力，修改完善论文，并在其达到刊发标准之后择期正式刊发。当然，若工作论文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则仍有可能被退稿。

“唯物辩证法”与革命文学理论建设

——以后期创造社为中心

李金花

[摘要] “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19年以来，“辩证法”虽然与“唯物论”被一起介绍到中国，但没有被充分重视。1928年以后，在后期创造社的努力之下，“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内涵第一次得到了较为系统的呈现。成仿吾、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以“唯物辩证法”为理论武器介入文学界的“理论斗争”，建设革命文学理论，阐明了文学革命必然转向革命文学；不过，他们同期的文学创作同理论主张并不一致。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还没有被创作出来。从长时段来看，后期创造社参与讨论建设的革命文学理论和实践，奠定了20世纪中国主导文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唯物辩证法；革命文学理论；后期创造社；理论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一、引言

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从今天国内主流哲学体系的日常教学和公共普及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中辩证唯物主义由辩证的唯物论和唯物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三部分组成。一段时间以来，学人的研究不仅涉及“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这一基础理论问题，^①还涉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这一基础理论问题。^②虽然针对这两个问题的成果不多，但这些成果基本解决了问题。不少学人的研究也涉及“唯物辩证法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这一基础理论问题，积累了一些成果，^③但多关注“唯物辩证法”在单一问题上的影响，忽视了不同单一问题背后的逻辑关系。不仅如此，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唯物辩证法”在中国传播之初是如何与文学理论建立关联的，很少论及其国际关联中涉及的哲学

作者：李金花，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lijinhua@lnu.edu.cn。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问题（1899—1925）”（23CZW001）阶段性成果。匿名审稿人提供了专业细致的审稿意见，在此谨表谢意。当然，文责自负。

① 程凯：《1920年代末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与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载《文史哲》，2007（3）；郭景华：《唯物史观对中国现代文论建构影响的另一种面相——兼论向培良“人类的艺术”观及其相关问题》，载《中国文学研究》，2021（1）；祁志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美学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的传播与崛起》，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23（5）等。

② 刘永明：《从反映论艺术观到文艺反映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反映论”发生前史》，载《汉语言文学研究》，2023（3）等。

③ 苟健朔：《创造社的“奥伏赫变”：一个理论术语与一场主体革命的发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6）；张大明：《昙花一现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载《新文学史料》，1985（2）；齐晓红：《一场关于创作方法的讨论——以阳翰笙〈地泉〉的五篇序言为中心》，载《小说评论》，2023（3）；刘永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生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24。

派别之争，很少考察其给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带来的系统性影响。

本文认为“唯物辩证法”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影响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19年到1930年，主要讨论“唯物辩证法”对中国文学方向转换的影响。此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后期创造社推进“唯物辩证法”在华的早期传播，并以此探索建设革命文学理论和革命文学创作。第二阶段主要是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和外部的作家分别讨论是否应在“唯物辩证法”影响下转变方向，即克服小资产阶级意识、获取无产阶级意识。第二个时期是1931年到1949年，主要是左翼作家以“唯物辩证法”探索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理论。此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体现为左联成立以后，先以“唯物辩证法”矫正革命文学的浪漫主义倾向，之后反思“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第二阶段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理论家，积极推进“唯物辩证法”的本土化，并将中国化的“唯物辩证法”应用到文学创作理论建设中。“唯物辩证法”几乎全程参与了现代文学理论建设，包括文学方向、作家意识、创作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

因为篇幅有限，本文将着重讨论第一时期第一阶段的问题，其他问题另述。这一时期太阳社和其他个人也都要求建设革命文学理论。后期创造社选择用“唯物辩证法”去建设革命文学理论。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关注较少，是再审视革命文学理论建设的新角度。本文将依据问题的推进，从“唯物辩证法”在华的早期传播、“唯物辩证法”在文学界“理论斗争”中的引入、“唯物辩证法”对文学创作的的实际影响等三个问题展开讨论。这里需要解释下后期创造社主张的革命文学。革命文学在不同历史进程和社会实践中分为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语境下，先后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性质的革命文学。如果说在“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运动中产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是服务于追求民主自由、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的；那么，在1928年以来的革命文学论争中产生的“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服务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任务的。^①在革命任务变化下，资产阶级革命文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取代。

二、理论背景：“唯物辩证法”在华的早期传播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理论准备不足。这种理论准备不足可以通过一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现代的出版数据来呈现。1921年7月到1927年7月之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译本有31种，而1927年8月到1937年6月之间有113种。^②理论著作出版的成倍增长是与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重视理论建设工作有关的。中国共产党在多次宣传会议中明确提出要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引进力度。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以及1929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都提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工作部署，并特别强调关注“在实际问题中如何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③“唯物辩证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介绍到中国的。1937年，毛泽东在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指出，“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进了一步，唯物辩证法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④

今天，学者站在历史的全知视角总结了“唯物辩证法”在华传播的意义。比如，单继刚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仅仅依靠唯物史观是不

^①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1313页，人民出版社，1991。

^②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247页，中华书局，1956。

^③ 《宣传工作决议案》，载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894页，学习出版社，1996。原文没有标注著者。

^④ 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二）》，载《抗战大学》，1938，1（7）。

够的,必须更完整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行,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中国的现实社会,形成真理性认识,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①“大革命”以前,“辩证法”思想已在中国传播。这是中国接受“唯物辩证法”的基础。此前,已有一些研究,但多突出瞿秋白的理论贡献。^②本文为保障问题的完整,还是会简要呈现20世纪20年代“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并关注研究中被忽视的后期创造社在“唯物辩证法”传播中的理论贡献。至于20世纪30年代以后“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笔者将在本系列的其他文章中论述,从而突出不同时期对“唯物辩证法”的不同阐释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影响。

学界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是逐渐深入的。在后期创造社传播“唯物辩证法”以前,“辩证法”就同“唯物论”一起被介绍到国内了,只不过不如“唯物论”的影响大。第一,“唯物论”和“辩证法”一起构成马克思学说。1919年7月18日,《晨报》上开始连载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一文,较早指出马克思学说是“从黑智尔哲学之中,採了进化的思索法、和唯物论结合起来。”^③此后,高阜素之指出,“辩证法的(即进化的)思索法”和“唯物论”结合成马克思学说。^④李汉俊认为,“马克思学说底组成分子是辩证法的(即进化的)思索法和唯物论的观察法。”^⑤当时流行的“进化论”影响了对“辩证法”的传播。“辩证法”与“进化论”不同。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⑥

第2,“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结合被称为“辩证法的唯物论”。1924年,瞿秋白在上海大学的演讲授课中对此进行了阐释。一方面,尝试在概念界定中摆脱以“进化论”直接阐释“互辩法”的方式。瞿秋白认为,“凡是研究一种现象,必须观察他的发生、发展及消灭”,“研究事物之动象”,“研究事物于其变动之中”,其中的动力就是“‘互辩法’或‘互变律(Dialectique)’”,其中“互变律”相当于自然科学中的达尔文学说。^⑦另一方面,提出“辩证法”之于现实的重要性,指出“社会科学中的根本方法就是互辩的唯物主义”,应当以“互辩律的唯物论”做“革命斗争的指针”,其中“互辩律”旧译“辩证法”。^⑧

第三,“辩证法的唯物论”在摆脱了“进化论”的影响以后,被用于批评机械唯物论。这一认识主要体现在1927年的两部译介文献中。堺利彦在《辩证法的唯物论》中认为所谓“辩证法”就是“辩证法的唯物论”,它是“马克思等的新唯物论,与纯粹机械的旧唯物论不同”。^⑨佐野学在《旧唯物论底克服》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旧唯物论多是机械论的、非辩证法的。^⑩1929年,狄慈根的《辩证法的唯物观》一书被翻译到国内。狄慈根被视作提出“辩证法的唯物论”的第一人。本书的译者杨东莼概括说,“辩证法的唯物论不是从固定上不是从静的方面以观察宇宙间的森罗万象,而是从动的方面从发展中从变化中以观察宇宙间的森罗万象。”^⑪

可以说,1928年以前学界几乎没有“唯物辩证法”这一表述,但有“辩证法的唯物论”。后期

① 单继刚:《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形成》,载《天津社会科学》,2023(4)。

② 参见徐素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应用形态前景》,北京出版社,2002;耿彦君:《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周良书、古帅:《“五四”精英对唯物辩证法的传播与应用》,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2);邹丽芬:《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5)。

③ 《马氏唯物史观概要》,载《晨报》,1919-7-18。原文没有标注著者。

④ 高阜素之:《马克思学说概要》,17页,商务印书馆,1922。

⑤ 汉俊(李汉俊):《唯物史观不是甚麽?》,载《民国日报》,1922-01-23。

⑥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601页,人民出版社,2009。

⑦ 瞿秋白:《现代社会学》,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441-442页,人民出版社,2013。

⑧ 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443页、576页,人民出版社,2013。

⑨ 堺利彦:《辩证法的唯物论》,3页、18页,北新书局,1927。

⑩ 佐野学:《旧唯物论底克服》,89页,创造社出版部,1929。该书早在1927年8月译完。

⑪ 杨东莼:《译者序言》,载《辩证法的唯物观》,5页,昆仑书店,1929。

创造社使“唯物辩证法”的概念及内涵第一次在国内得到较为系统的呈现。第一，总结了“辩证法”的基本法则，即对立统一、变化联系、质量转化等。后期创造社翻译介绍了德博林、布哈林对“辩证法”的认识。德博林认为，“辩证法”是客观世界与人类认识的根本原则，主张对立物之同一或统一。只有从对立物的统一上，才能说明飞跃、由量到质由质到量的推移。^①布哈林认为，“辩证法”是“一切存在着的底变化底过程。存在着的底联系，由矛盾的方法而成的发展及从量到质的转换。”^②《文化批判》的“新辞源”栏目还介绍过“奥伏赫变”这一概念。“奥伏赫变”“是黑格尔哲学的特有的用语，用以表示辩证法的进程的。”^③

第二，厘清了“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的差别，即“辩证法的唯物论”是世界观，“唯物的辩证法”是方法论。《文化批判》的“新辞源”栏目中指出，“现代革命的新兴阶级底世界观，人生观及社会观”建立在“辩证的唯物论”之上，“唯物辩证法”是“适应于辩证法的唯物论的研究方法，与辩证法的唯物论有密切不离的关系。”^④不过，在此阶段出版的介绍“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译）著作中，以及在以“唯物辩证法”探讨文学问题的文章中，依然有许多将“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混用的情况。这一辨析虽然没有改变当时混用的局面，但依然有其问题史意义。

第三，确认了“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的真正科学方法；只有用“唯物辩证法”才能对社会有全面的认识，才能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朱镜我认为，“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的真正的科学方法。只有这一方法才能对事实的全体性——事实的本质、必然及运动，有深刻的洞察。^⑤此后，他又进一步补充，认为只有用这样严密的方法，才能研究社会、理解社会。^⑥彭康也指出，“唯物的辩证法”是唯一的科学方法，“应用唯物的辩证法以解决一切紧迫的问题”。^⑦后期创造社并不满足于只在哲学概念本身讨论“唯物辩证法”，还有意用其去介入现实。这就有了他们将“唯物辩证法”引入文学界的“理论斗争”的实践。

总之，后期创造社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译介和阐释了“唯物辩证法”。他们对“唯物辩证法”的译介和阐释，基本上形成了这一理论在中国的雏形。1928年以后，“唯物辩证法”逐渐被阐释为适用于“辩证法唯物论”这一世界观的研究方法，即从矛盾对立、本质与必然、运动发展、质量互变的立场上，去研究社会、理解社会；“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关系被初步辨析。

三、“唯物辩证法”在文学界“理论斗争”中的引入

“唯物辩证法”的在华传播，在某种程度上给文化新发展方向的探索提供了哲学依据。正如郭沫若在回忆中指出，“一九二八年，中国的社会呈出了一个‘剧变’，创造社也就又来了一个‘剧变’。新锐的斗士朱，李，彭，冯由日本回来，以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创造社的新旧同人，觉悟的到这时候才真正的转换了过来，不觉悟的在无声无影之中也就退下了战线。”^⑧创造社原成员成仿吾、郭沫若等转换方向以后，与朱镜我、李初梨、彭康、冯乃超等新生力量组建了后期创造社，并开拓了《文化批判》《创造月刊》《思想月刊》《流沙》等

① 德博林：《唯物辩证法精要》，载《文化批判》，1928（5）。

② 布哈林：《辩证法底唯物论》，46页，江南书店，1929。

③ 同人：《新辞源》，载《文化批判》，1928（1）。

④ 同人：《新辞源》，载《文化批判》，1928（1）。

⑤ 朱磐（朱镜我）：《理论与实践》，载《文化批判》，1928（1）。

⑥ 朱镜我：《科学的社会观》，载《文化批判》，1928（1）。

⑦ 彭康：《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的总结算》，载《文化批判》，1928（2）。

⑧ 麦克昂（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载《文艺讲座》，1930（1）。

“战场”，来践行“文化批判”。需要说明的是，在后期创造社组建前后，郭沫若、朱镜我、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成仿吾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党派身份使他们的活动在有意或者无意之中，有了方向引领的意味。

成仿吾在写给《文化批判》的《祝词》中详细阐明了“文化批判”的任务。文中指出，中华大国在一百年来，被取榨与被笑骂。现在是算总账的时候了。之所以要从建设革命理论开始，是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行动”。具体说来，需要在理论上辨清现在社会的构成、现在世界的趋向、自己的形势。“文化批判”要负起它的历史任务——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科学，文艺及其余个个的分野皆将从‘文化批判’明了自己的意义，获得自己的方略。‘文化批判’将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给与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光火。”^①那么，后期创造社用“唯物辩证法”在文艺，尤其是文学领域中建设了哪些革命理论，展开了哪些理论斗争？李初梨曾回忆指出，“大革命”失败以后，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介绍了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现实的新武器”，提出“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普罗文学”。^②那么，具体的建设过程如下：

第一，后期创造社以“唯物辩证法”在原理上阐释了社会形态转变与意识形态转变的关系。彭康指出，“社会是一个矛盾的总体，它自己内部就含有否定自己，奥伏赫变自己的契机。这个契机（moment）在它底内部发生，成长，终于把它推倒，出生一种社会的新形态。这是所谓社会进化底飞跃。意识形态立在社会的基础，发生的时候，固然可以助长它底发展，统一它底理论；但是社会底矛盾暴露，对立激化，新的形态萌芽的时候，意识形态反变为进化底阻碍，对于新的事实失了解释的能力。在这时候，社会需要一种全面的自己批判。建设一种适合于新社会形态的理论。这种理论同时又是推翻旧社会的精神的武器。这就是所谓意识形态里的方向转变，就是思想革命。”^③此后，彭康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简化的表述，即“新社会形态是从旧社会的胎里发生的，因而旧社会的瓦解过程即是新社会的具体过程。意识形态是与这过程取同一的步骤的，旧意识形态的崩坏过程必然地又是新意识形态的确立过程。”^④由此可见，社会内部是有否定性力量的。在新旧社会形态交替的时候，旧意识形态逐渐崩塌并生出与新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新意识形态。后期创造社与其他团体、个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只思考革命文学应该怎样，还回到哲学起点，以“唯物辩证法”为工具科学地思考为何会产生革命文学。

第二，后期创造社以“唯物辩证法”具体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没落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产生的关系。一方面，随着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全面批判的展开，文学革命将转向革命文学。成仿吾认为，“我们要研究文学运动今后的进展，必须明白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的现阶段；要明白我们的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必须从事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全部的合理的批判（经济过程的批判，政治过程的批判，意识过程的批判），把握着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明白历史的必然的进展。”因此得出，“今后的文学运动应该为一步的前进，前进一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结论。^⑤王独清肯定了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的方向引领作用，认为他的这篇论文是“今后同人要从事于新努力的一篇宣言。”^⑥之后，成仿吾又指出，“将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Ideologie）与旧的表现样式奥伏赫变”，“批判指出一种文艺的必然的发展与必然的没落”。^⑦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没

① 成仿吾：《祝词》，载《文化批判》，1928（1）。

② 李初梨（梨）：《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载《解放》，1937，1（24）。

③ 彭康：《哲学底任务是什么？》，载《文化批判》，1928（1）。

④ 彭康：《什么是‘健康’与‘尊严’？——‘新月的态度’底批评》，载《创造月刊》，1928，1（12）。

⑤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创造月刊》，1928，1（9）。

⑥ 王独清：《今后的本刊》，载《创造月刊》，1928，1（9）。

⑦ 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载《创造月刊》，1928，1（10）。

落过程中，会产生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宣传无产阶级意识的。傅克兴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没落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会暴露它的矛盾，而必然地产生新的意识形态，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①傅克兴明确提出，“革命文学与无产者文学同是宣传新意识形态底文学。”^②后期创造社用“唯物辩证法”在理论上阐明了社会形态转变过程中新意识形态必然取代旧意识形态的问题；具体说明了在近代资本主义批评过程中，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然取代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问题。后期创造社之所以关注文学方向的转换，是因为文学是社会革命过程中的“意识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要补充的是，后期创造社重视的“意识斗争”就是“理论斗争”。《文化批判》“新辞源”栏目详细阐释了什么是“理论斗争”。“理论斗争亦名意识斗争，是对于一切的思想与运动施以严密的批判检讨的斗争。它与经济斗争及政治斗争是无产阶级必须战取的三个斗争形态”。“理论斗争”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因为“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是资产阶级底重要的支配工具，不把这个克服，阶级斗争是不会进展。”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要在内部进行理论斗争，因为“无产阶级内部的机会主义及小资产阶级根性须彻底地克服，注入目的意识性，使屈服于自然生长性的经济斗争扩大到政治斗争，这些都非经过猛烈的理论斗争不能达到。”^③

那么，后期创造社是如何知道“意识斗争”的？其主要成员在京都帝国大学学习期间受到当时风靡一时的福本主义影响。福本和夫曾经于1925年11月在京都帝国大学演讲。演讲内容后来整理成了《社会进化论——社会底构成及变革过程》一书。书中指出，需要以“唯物辩证法”来考察“意识过程”。^④国内学者对福本和夫理论及其中国影响的研究已有不少。王志松认为，福本理论显著地影响了《文化批判》同人。^⑤张广海认为，后期创造社从福本主义那里学到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他们不仅研读了福本和夫，也直接从卢卡奇和柯尔施获得了理论资源；福本和夫曾在美英德法留学，追随过柯尔施、结识了卢卡奇。^⑥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曾经以《新社会之哲学的基础》一名，由上海南强书局在1929年出版，其中涉及“意识斗争”。

不仅如此，从后期创造社的论述中可以知道他们熟悉列宁的“理论斗争”主张。成仿吾的《祝词》、李初梨的《一封公开信的回答》等文章提及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最早出现在列宁于1901年秋到1902年2月完成的《怎么办？》中。他不仅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还提出“理论斗争”——“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像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⑦“理论斗争”同“政治斗争”“经济斗争”一样重要。然而，“理论斗争”的提出还可上溯到恩格斯。恩格斯早在1874年的《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提出了理论问题在工人运动中的重要性，指出德国工人运动虽然开展最迟，但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第一次在其所有三个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进。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集中的攻击。”^⑧

总之，后期创造社将“唯物辩证法”引入文学界的“理论斗争”，阐明了为何社会革命会引发

① 克兴（傅克兴）：《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唯物辩证法》，载《思想月刊》，1928（2）。

② 克兴：《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革命文学底根本问题底考察》，载《创造月刊》，1928，2（2）。

③ 同人：《新辞源》，载《文化批判》，1928（4）。

④ 北条一雄（福本和夫）：《社会进化论——社会底构成及变革过程》，27、179-180页，大江书铺，1930。

⑤ 王志松：《福本和夫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的“革命文学”——杂志〈文化批判〉及其周边》，载《20世纪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⑥ 张广海：《再论后期创造社与福本主义之关系》，载《汉语言文学研究》，2016（2）。

⑦ 列宁：《怎么办？》，载《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6卷，23-24页，人民出版社，2013。

⑧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18页，人民出版社，2009。

意识形态革命，并说清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没落中，作为新意识形态之一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然取代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原因。如果说，“五四”以来“唯物史观”在文学上的应用说明了文学革命发生的合理性以及新文学出现的必然性，那么1928年以来的“唯物辩证法”则给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又必然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学理上提供了哲学依据。

四、“唯物辩证法”对文学创作的 actual 影响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后期创造社将主要理论观点发表在《文化批判》《创造月刊》《流沙》《思想月刊》等刊物上，说明了为何接受“唯物辩证法”以及为何文学革命必然转向革命文学，并且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后期创造社中一些成员还将同期创作的作品发表在这些刊物上。那么，后期创造社引入的“唯物辩证法”有没有对文学创作产生实际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是否与他们的理论主张相一致？他们有没有创作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这篇文章中界定了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文中指出，在方法上，“作家必须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法论者”，进而去观察、来描写；在题材上，“必须将那些‘身边琐事’的，小资产智识份子式的‘革命的兴奋和幻灭’，‘恋爱和革命的冲突’之类等等定型的观念的虚伪的题材抛去。”^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此针对此前后创造社和太阳社文学创作提出的问题，虽然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一定道理。本文讨论的后期创造社作家虽然成为了“唯物辩证法论”者，但其作品还在“转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上。鉴于以往学界对这些不太“有名”的作品关注不多，以下将按照文体分类进行详细说明。

第一，抒情类作品抨击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文中充满热烈的情感，疾呼的口号，革命的兴奋。其一，描绘帝国主义剥削下生活在“地狱”中的民众。冯乃超在《上海》中描述了上海的艰难处境，“上海简直一个战场”，在这战场中有“列强的旗帜飘扬”“牢狱的围墙”“武装的征服”，但“我们底明日快到了，/听，解放的晨钟在响。”^②冯乃超在《与街上人》中指出街上人的一生，只有“慢性病”“贫穷”和被剥夺了的“生存权”，但“明日是我们的！明日是我们的！”^③“明日”是作家给民众“灌输”的对于未来的希望。作家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高于”民众的位置。

其二，聚焦帝国主义侵华具体事件，表现士兵的杀敌和民众的抗争。冯乃超的《流血的纪念日》是为了纪念“五卅”惨案而写，“英国的卫兵虎狼一般凶暴地咆哮，/虐杀我们没有武装的民众？”，而兵士，“他们死了，刑戮了，只是我们被征服的阶级举反抗的扬声。”^④冯乃超的《民众哟，民众！》因“济南事件”而写，“海上浮着超级弩舰的蜃楼，/陆上放着毒瓦斯的气囱。/济南的城内没有一个中国人。”因此，冯乃超呼吁“恢复我们的民众运动，击止帝国主义的进攻！”^⑤虽然重大事件成为了创作的题材，但是作家没有表示自己将来要加入流血的斗争。

其三，赞美打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工人。黄药眠在《五月歌》中指出：“啊，朋友们，待我们起来做一个开扩新时代的工人，/待我们起来把这不合理的世界全盘推倒！”^⑥龚冰庐在《汽笛

①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载《文学导报》，1931，1（8）。原文没有标注著者。

② 冯乃超：《上海》，载《文化批判》，1928（1）。

③ 冯乃超：《与街上人》，载《文化批判》，1928（1）。

④ 冯乃超：《流血的纪念日》，载《文化批判》，1928（2）。

⑤ 冯乃超：《民众哟，民众！》，载《文化批判》，1928（5）。

⑥ 黄药眠：《五月歌》，载《创造月刊》，1928，1（12）。

鸣了》中指出，“成千成万的男女，童工，/我们起来，起来为这旧世界撞打葬钟。/我们是新世界的东翁，/我们要创造我们的世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劳动。”^① 黄药眠在《冬天的早晨》中指出：“啊，你看，这冬天的早晨已经完全为工人所有，/资本家的命运将随着残冬的夜色消沉，/惟有无产者的精神才最能耐劳耐苦，/啊，起来歌罢，起来歌罢，起来赞美这伟大的时辰。”^② 那么，作家在新世界中除了赞美，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第二，戏剧类作品多从“身边琐事”出发，以简单的人物、对话，再现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作家注意到在社会矛盾的激烈冲突中有了觉醒的民众。作家虽然有时会在情节中特意安排一个启蒙者，但没有表现被启蒙以后的人物的具体行动。其一，民众意识到造成他们不幸的根本是资产阶级的剥削，或是统治官僚、土豪劣绅、新兴军阀、帝国主义的压榨。冯乃超的《同在黑暗的路上走》中准备打劫“野雉”的主人公“小偷”，就活在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之中。青年启蒙者说，“你是小偷，她操皮肉生涯，我要卖血汗的劳动，同是受虐待的阶级，同是被榨取的阶级。”^③ 龚冰庐的《莘庄镇》中的日本人攻打山东，并抢去一切。然而国民党军队不做抵抗，只留下百姓等待厄运降临。^④ 冯乃超的《县长》中县长和劣绅将军队摊派下来的供养费用，转嫁到群众身上，编造了捐税等。^⑤ 作家虽然表现了觉醒的民众，但只限于“团结”“打倒！”等口号，没有具体说怎么办了。

其二，社会转型期的思想矛盾被呈现出来。冯乃超的《支那人自杀了》主要以对话的形式表现思想矛盾。海外工人在面对黑暗社会时有“忍耐者”、“积善积德者”、“遵纪守法者”、“及时行乐者”，还有“放弃幻想者”；陆军学生在面对黑暗社会时有“为生存而反抗者”、有放弃战争的“虚无主义者”，还有求之于宗教的“温情主义者”。大学生认为，这个世界已经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对立，即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⑥ 民众中的“自发觉醒者”被突出，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学说传播中的作用也被突出。

第三，叙事类作品呈现了特定情境中的人物抉择。作品中人物较抒情类作品和戏剧类作品有了直接的革命行动。龚冰庐、阳翰笙、郭沫若等亲身参与革命斗争一线、工人生产一线的经历，使他们表现无产阶级的作品更加立体、鲜活、感人。其一，知识分子开始组织对剥削阶级的反抗。冯乃超的《Demonstration》写知识分子组织了一场游行。游行中领袖人物被警察带走。剩下的群众高喊“普罗列塔利亚万岁”。^⑦ 相反，华汉的《马林英》写马林英从一名模范女大学生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带领士兵从枪林弹雨中突出重围，又组织更多贫穷的农友打杀有钱有势的人。农友们公开抗租，没收财主田地。^⑧ 《马林英》是此期少有的展现知识阶级深入农工大众的作品。

其二，普通民众从现实境遇、自我遭遇出发，反抗剥削压迫。龚冰庐的《裁判》中的陈兆老伯面向人群说起自己、儿子作为矿工的命运，试图唤起人们的思考。工人受陈兆老伯的激发开启罢工。^⑨ 郭沫若《一隻手——献给新时代的小朋友们》中的工人领袖想要救助在机械事故中断了右肘的小普罗，却不被管理人员允许。于是，组织工人发起暴动。^⑩ 龚冰庐的《炭矿夫》写了一家三代矿工的命运。第一代病死在矿上，第二代在组织罢工中被枪杀，第三代八岁的孩子又报名到矿上做

① 龚冰庐：《汽笛鸣了》，载《创造月刊》，1928，2（2）。

② 药眠（黄药眠）：《冬天的早晨》，载《创造月刊》，1928，2（4）。

③ 冯乃超：《同在黑暗的路上走》，载《文化批判》，1928（1）。

④ 龚冰庐：《莘庄镇》，载《思想月刊》，1928（2）。

⑤ 冯乃超：《县长》，载《创造月刊》，1928，2（4）。

⑥ 冯乃超：《支那人自杀了》，载《文化批评》，1928（3）（4）（5）。

⑦ 冯乃超：《Demonstration》，载《文化批判》，1928（2）。

⑧ 华汉（阳翰笙）：《马林英》，载《流沙》，1928（1）（2）（3）（4）。

⑨ 龚冰庐：《裁判》，载《文化批判》，1928（2）（3）。

⑩ 麦克昂：《一隻手——献给新时代的小朋友们》，载《创造月刊》，1928，1（9）（10）（11）。

工。工人举行罢工并炸毁了矿区。^①工人有组织的斗争开始被作家表现。

其三，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的底层认识到自身的处境和阶级的矛盾，但他们的反抗都是无力的。龚冰庐的《悲剧的武士》中的警察 A 常年守夜。他认识到警察是给有钱人看街，小偷是犯了没有钱的罪，法律只保护有钱人。当警察厅长辱骂他时，他朝着警察厅长放枪了，但自己也倒在了血泊之中。^②冯乃超的《被收买的生命》中的阿根是国民政府中普通士兵，他和同僚都不理解为何一定要北伐，一定要中国人自相残杀，而不是与占了城池的东洋鬼子搏杀。^③这类人是作品中的新形象。他们的觉醒暗示着旧社会已在内部开始瓦解。

其四，无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因共同受到官僚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进而相互同情。华汉的《趸船上的一夜》写办过工会的码头工人，让逃难来的本夫到趸船休息、躲避巡捕。二人都受官府的压迫和洋大人的敲诈。^④冯乃超的《慰卹金》中的电车司机陈亚根在与法兵冲突中，被刺伤身亡。工会及工人知道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报仇，但罢工要等待时机。工会给陈家争取来了抚恤金。^⑤虽然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有了具象化呈现，但作品中流露出的妥协性是值得关注的。

总体说来，虽然后期创造社主张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但其作品还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呈现出过渡状态。虽然作家将更多的无产阶级作为表现对象，超越了“五四”新文学作家的题材范畴和思想立意，但作品中无产阶级的“觉醒”多是因自身的不幸遭遇。无产阶级仍与“革命”知识分子有隔阂。这说明了，作家只靠掌握“唯物辩证法”无法创作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五、结语

“唯物辩证法”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解决了各个历史时期文学理论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并且直到今天依然处于引领地位。以往的研究几乎没有系统讨论这个问题。个别研究者认为，“唯物辩证法运动的直接结果是推动了 20 世纪 20—30 年代革命文艺的两次抉择”，其中一次是“‘革命文学’论争引发的革命文学理论无产阶级化”。^⑥其实，这一工作最早主要由后期创造社完成。后期创造社第一次系统阐释了“唯物辩证法”，并将“唯物辩证法”与文学理论建立联系，建设一条与太阳社等团体或者个人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道路。具体说来：

第一，“唯物辩证法”在华的早期传播，是其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前提。1919 年到 1930 年之间，“唯物辩证法”在社会现实动力之外，给革命文学理论的发展在学理上提供了哲学依据。尽管 1919 年之后，“辩证法”与“唯物论”一起传入中国，但“辩证法”被相对忽视了。1928 年以来，后期创造社才第一次对“唯物辩证法”的内涵及现实意义进行了较为系统、完整、准确的表述，即从矛盾统一、质量互变、飞跃发展的过程来理解社会。虽然“唯物辩证法”与“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有被阐释，但二者有时依然被混用。

第二，“唯物辩证法”提供了解释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的哲学依据。“唯物辩证法”在“唯物史观”之后，成为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哲学依据。一方面，“唯物辩证法”解释了社会形态转变与意识形态转变的关系，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具体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没落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长的关系。新社会形态是在旧社会形态的瓦解中生长出来的，新意识形态也是在旧意

① 龚冰庐：《炭矿夫》，载《创造月刊》，1928，2（2）（3）（4）。

② 龚冰庐：《悲剧的武士》，载《文化批判》，1928（4）。

③ 冯乃超：《被收买的生命》，载《思想月刊》，1928（2）。

④ 华汉：《趸船上的一夜》，载《创造月刊》，1928，2（4）。

⑤ 冯乃超：《慰卹金》，载《创造月刊》，1929，2（6）。

⑥ 刘永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生学研究》，120 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24。

识形态的崩坏中产生出来的。“五四”后期的革命文学萌芽，慢慢摆脱自然生长，凝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潮流。

第三，“唯物辩证法”没有使后期创造社立刻创作出与他们革命文学理论主张相一致的文学作品。他们的革命文学理论先行于革命文学创作。抒情类作品借用了现实重大事件，但所用的表现形式不适于大众。叙事类作品和戏剧类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革命理论，但缺乏生活经验，未能与大众结合；无产阶级大众没有获得真正的启蒙，他们的斗争依然是情绪性的、自发性的。后期创造社的经验表明，仅靠“唯物辩证法”无法创作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尽管如此，他们创作的“革命文学”依然是当时中国文学界最重要的尝试之一。

总之，我们在文中不仅考察了后期创造社的革命文学理论主张，也考察了他们的创作实践，进而讨论起他们的理论与创作是否一致。以往学界在教学和研究中关注的革命文学创作，更多是太阳社蒋光慈、洪灵菲等的“革命罗曼蒂克”作品。实际上，后期创造社并非只停留于革命文学理论的探究，也尝试了革命文学的创作，只不过没有像太阳社那样形成独特的风格。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虽然依靠“唯物辩证法”或许可以建设出革命文学理论，但只有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介入社会实践，才能创作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只有这样，“唯物辩证法”才能真正焕发出它的理论生命力。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volutionary Literary Theory: Focusing on the Later Society of Creation

LI Jinhu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of Liaoning University)

Abstract: Materialist Dialectics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ince 1919, although “dialectics”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together with “materialism”, it has not been given adequate attention. After 1928,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the Later Society of Creation,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was presented systematically for the first time. Cheng Fangwu, Li Chuli, Feng Naichao, Peng Kang, and others use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s a theoretical weapon to engage in “theoretical struggle” within the literary community, construct revolutionary literary theory, and elucidate the inevitable transition from literary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However, there was a divergence between their literary works and their theoretical advocacy of the same period.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has not yet been created. In the long run,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hat the Later Society of Creation participated in discussing and constructing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dominant literature in 20th-century China.

Key words: Materialist Dialectics;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he Later Society of Creation; Theoretical struggl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02页，人民出版社，2009。